



复旦
中华文明研究
专刊



怀旧与现代都市

冯 进 编

 复旦大学出版社



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

怀旧与现代都市

冯 进 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怀旧与现代都市/冯进编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8. 10
(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)
ISBN 978-7-309-13979-2

I. ①怀... II. ①冯... III. ①城市社会学-文集 IV. ①C912.8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26282 号

怀旧与现代都市

冯 进 编

责任编辑/史立丽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960 1/16 印张 9.75 字数 142 千

201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13979-2/C·373

定价: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总序

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(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, ICSCC)成立于2012年3月。中心以复旦大学人文学科为平台,旨在依托本校深厚的人文学术资源,积极推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研究,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。我们知道,自明末利玛窦(Matteo Ricci)来华以后,欧洲和北美,即所谓“西方”的学者对中华文明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,历来称为“汉学”(Sinology)。近年来,中国学者为了与清代“汉学”相区分,又称其为“海外汉学”。在欧美,学者为了区别传统的“Sinology”,又主张把现代研究称为“China Studies”(中国学)。ICSCC旨在促进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在中华文明研究领域内的国际交流,推动双方之间的对话与融通。

历史上,欧美汉学家有自己的旨趣和领域,他们的方法和结论,常常别开生面,新论迭出。在当今全球化时代,中国以外的国际学者早已跨越障碍,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;中国大陆的新一代学者也已经接续百年传统,回到国际学术界,与海外同行们频繁交流。但即便如此,海外汉学家和中国本土学者在很多方面,诸如文献整理、田野调查、新领域开拓以及方法论、世界观上仍然存在很大差异。海外学者所长,即为本土学者之短,反之亦然。有一种观点认为,本民族的文化,很难为另一种文化内的学者所理解。甚或是说:外国人必不能以正确的方式看待“他者”的文明。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,在于用某种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堵塞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。事实上,无论在历史上,还是在当下现实中,人们都不只是生活在单一的文化中。东海西海,圆颅方趾,文化的特殊性是相对的,人性的共通性才是绝对的。为了达成对中华文明的正确理解,显然还需要中外学者坐下来,用对

话、讨论的方式作沟通与融合。无论如何，海外汉学家早已成为与中国大陆和港、澳、台地区华人学者同样重要的研究群体，他们对于中华文明也有着独到的理解。“海外汉学”的研究成果，值得我们本土学者加以重视，全单照收和简单排斥都是要不得的极端态度。

四百年前，明末“西学”翻译运动先驱徐光启说：“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先须翻译。”我们把明末的这句格言引申出来，作为中外学术交流中的“金科玉律”。中西方学者之间相互借鉴，即了解对方工作的真实意义和真正主张。立场不同，可阐发双方优长之学；视角各异，可兼收领域互补之效；观点针芒，实可在讨论之后达成更加充分的会通和融合。四百年来，明、清、民国的经学家、国学家，一直和欧美的传教士、外交官和“中国通”切磋学问，现代中国的儒学、佛学和道学，无一不是在与利玛窦、艾儒略、林乐知、李提摩太、李佳白、费正清、李约瑟等欧美学者的对话交流中，经过复杂的交互影响而形成的。离开了“西学”（Western Learning）和“汉学”（Sinology）的大背景，从徐光启、阮元的“新学”，到康有为、章太炎的“国学”，都不可理解。我们相信，学术领域此疆彼界的畛域之分，既不合理，也无可能。海外汉学（中国学）与中国本土学术并不冲突，所谓的主客之争，那种有你没我的势不两立，完全没有必要。

有鉴于此，ICSCC 设立专项资金，面向海外，每年邀请国外优秀中青年学者访问复旦大学，与本校、上海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同行学者们充分交流。通过学术报告、小型工作坊、论文集和学术专著的编译出版等，构建访问学者与国内学者的全方位、多层次交流体系，促进海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学者之间的互动。中心邀请来访的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，将他们主持的工作坊论文，经过作者本人的修改、增订，或由编者整理、翻译，结集出版，即为“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”系列。我们希望藉此工作，展现中外学者精诚合作的成果，以饗学界。

前言

冯 进

2015—2016 学年我从长期任职的美国格林奈尔大学(Grinnell College)获准学术休假一年,于 2016 年 3 月起在母校复旦大学的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学三个月。访问学者平日不教课,不坐班,可以潜心研究。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访学结束前举办一个工作坊,邀请海内外人士探讨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。充实的访学生活转瞬即逝,在恩师陈思和教授及各位师兄师妹的襄助、现当代文化研究领域诸位同仁的支持、中心章可与钱宇两位老师的协作下,“怀旧与现代都市”工作坊于 2016 年 5 月 27—28 日在复旦大学顺利举行。

定下这个题目早在 2016 年 2 月。和当年的硕士导师、复旦中文系教授、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商定计划后,他出面邀请了以描摹当代都市知名的几位华文作家:写南京的叶兆言、写上海的金字澄、写武汉的方方及写鹿港的台湾作家李昂。我也有幸请到了在海内外高校任教,对怀旧主题有兴趣、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发表论文、主持点评。第一天下午举办作家论坛,第二天安排了四个小组的学术论文发表。发言者依次为同济大学张建龙教授、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李翠玉教授、上海大学陈晓兰教授、复旦大学段怀清教授、南京大学刘俊教授、复旦大学张业松教授、台湾“中央”大学焦桐教授和我。主持、点评人则分别为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、美国威斯理大学(Wellesley College)宋明炜教授、香港科技大学吴盛青教授、美国肯塔基大学(University of Kentucky)罗靚教授及陈思和教授。最后一天下午以圆桌讨论压轴,工作坊圆满结束。

为时一天半的工作坊内容丰富,气氛热烈,盛况可喜——举办作家论坛时会议室座无虚席,地板上坐了人,连走廊里也站满了人。参加者来自内地、香港、台湾、美国,包括作家、研究者和建筑师,专业领域、研究专题、视角方法各异,在相互讨论及与观众的互动中阐发、探索了怀旧的定义、呈现、衍生等各层面的问题。四位作家分享他们书写老城市的体会,兼及对当代城市改造的意见与对怀旧的理解,妙语连珠。多位学者考察了现代都市中或围绕现代都市发生的有关怀旧的体验、表达和实践,深入浅出。

本次工作坊的书面产品基本收入本文集。第一部分收录三位作家有关怀旧的精彩论述:叶兆言与金宇澄两位分别发表于《作家》与《南方周末》的作品,以及台湾诗人、美食家、出版家焦桐的散文。第二部分则收录学院中人的6篇论文,分为上海——建筑与叙事、异邦都市、怀旧与身份构建、美食怀旧四个专题。

西方研究者认为怀旧和现代化密切相关。因为伴随现代化进程的工业化、都市化彻底改造了传统社会,造成世界各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趋同化,即所谓“全球化”(globalization)。2015年去世的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、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博伊姆(Svetlana Boym)曾说过:“对流离失所与时光不可逆转的哀悼组成了现代体验的核心。”她思考了欧洲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对集体记忆的影响,把怀旧分为“修复型”(restorative)和“反思型”(reflective)两种;前者寻根溯源,力图恢复乌托邦式的过往,后者既惆怅、反讽(ironic)地享受怀旧情绪,又“推迟回归家园”^①。我们从三位作家的著述与行动中不难同时发现反思型和修复型怀旧。

叶兆言说,“怀旧就是纸上谈兵”,代表了文化人“无可奈何的沧桑感”。他写南京这个“只能接受与忍受的城市”代表的“消失的繁华”,清醒地认识到怀旧文学实际立足于选择性记忆和虚构。但怀旧真的只是作家的虚张声势吗?金宇澄认为怀旧能够疗伤,怀旧是为了继往开来。他的作品关注迅速消逝的老上海的传统建筑,如《繁花》中写到的长乐路中学、瑞金路帝王堂,谋求通过文学再现来保存城市历史。他也常应邀给有关部门做报告,呼吁保全“街角”美景。而尽管自嘲是“说了也白说”的弱者、“遗少”,叶兆言还

^① Svetlana Boym, *The Future of Nostalgia*, New York: Basic Books, 2001, p.XVIII.

是多次参与了保护南京古城墙和法国梧桐的行动。同样,焦桐剖析台湾“古早味”,虽然指出人们耳熟能详的古早味“其实是对古早的想象和模拟。古早味是现存的过去,是当下的一部分”,但他从对台式日料、台式西餐、台式乡愁美食的描述一直说到提倡“在地农业运动”,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字终归于对“崇尚自然”的古早、“老实”态度的礼赞。

然而,怀旧显然标示着缺失和相异性,怀旧者追忆的是早已逝去或从未存在的过往。唐小兵指出,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“既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,又是治疗这种不满的药方”,因为这种“治疗式写作”确立了作者的“沉思式主体”(contemplative subjectivity),有助于他们对未来进行不同的构想^①。黄子平也提到了中国现代作家通过“故乡的食物”回忆特定时空,用味觉记忆建构人生经历、地域身份和文化遗产^②。6位研究者的论文同样考察了不同地域、不同时期的各种怀旧文化产品。

张建龙描述上海里弄住宅“前后有关联但始终在变化发展的微叙事链”,揭示其“空间的均质特点和用户的‘落脚’特征:即,在一段时间内使用者相对稳定,但在较长时间内使用者是变化的,每一阶段的使用者会对空间进行自主更新建造,进行自己的空间微叙事”。李翠玉讨论根据日裔美籍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改编的电影《异国情缘》(*The White Countess*),指出该片体现了“石黑一雄对上海的去畛域化(deterritorization)及再畛域化(reterritorialization)、去空间、去地理尺度的历史怀旧”,并进一步揭示其历史怀旧的意义和怀旧所具有的“救赎政治动能”。一个分析上海的实体建筑,一个考察文学、电影中的上海,虚实对应。

陈晓兰探讨英国作家艾克洛德(Peter Ackroyd)的《伦敦传》。这位“把城市当作人性的存在并为其作传的作家”在描述伦敦这个“多重时间平行又交叉的迷宫”时,“穿越于现在、过去与未来之间,从现在出发回望历史、想象未来,并通过历史理解现在”,通过记录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五光十色的经验描述一个地方的历史。段怀清解读王韬、袁祖志二人的海外纪行,指出他们

^① Xiaobing Tang, *Chinese Modern: 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an*, Duke University Press, 2000, p.87.

^② 黄子平:《故乡的食物:现代文人散文中的味觉记忆》,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03年第4期。

都“触碰到晚清其实亦朝向现代的某些基本文化命题”，如“跨语际、跨文化交流中个人亲身体验的存在及其无可替代性，强调了在知识流动传播过程中人的主观性”。同样聚焦异国都市，艾克洛德与袁祖志和王韬一西一中，一个纵向，一个横向，视角、态度迥然相异。

刘俊关注“怀旧”这个几乎贯穿白先勇所有创作的“母题”，展示了他如何从早期“《台北人》中‘今不如昔’式的‘单纯的怀旧’，发展到中后期《纽约客》中‘拥抱当下’式的‘动能的怀旧’”，如何将繁华逝去的怨艾转化为促进新生的动力。笔者则通过田野调查比较杭州老字号和“新字号”面馆如何包装、营销美食怀旧，满足对个人与集体身份饱含焦虑的当代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的需求，提出“家国政治的支持与干预下的当代中国美食怀旧同时提供了折射社会、文化的棱镜与身份政治斗争的场域”。相较于刘文关注怀旧的文学再现及其积极意义，拙作更多展示怀旧在当代中国喧嚣浮躁的文化实践。

本次工作坊的讨论证实：怀旧与时空、地域、情感、身份，与历史、当下、未来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复杂关联。怀旧必然包含的两重置换——用对地点的感怀取代对时间的追忆，把对现实的不满装扮为对往事的眷恋——依旧适用于当代中国，但具体表现千变万化。归根到底，文学艺术对怀旧的表现与再现植根于社会文化的现实，而怀旧也为各类文化产品的生成提供了契机和动力。

目录

1		前言
1	叶兆言	怀旧,废墟上的徘徊
10	金宇澄	我们有历史,眼前却总是新建筑
23	焦 桐	台湾古早味
29	张建龙	怀旧与现代都市:空间微叙事
33	李翠玉	上海倒影:石黑一雄《异国情缘》之历史怀旧
40	陈晓兰	城市书写:在碎片化、流动性中寻求统一性与连续性 ——以彼得·阿克罗伊德的《伦敦传》为例
48	段怀清	果到中华以外天 ——袁祖志的海外杂事诗与王韬的《漫游随录》
66	刘 俊	从“单纯的怀旧”到“动能的怀旧” ——论《台北人》和《纽约客》中的怀旧、都市与身份建构
75	冯 进	试论当代中国的“美食怀旧” ——以杭州两家面馆为例
92	附录一	“怀旧与现代都市”工作坊开幕式暨作家论坛发言整理稿
125	附录二	“怀旧与现代都市”工作坊圆桌讨论发言整理稿
147	作者简介	

怀旧,废墟上的徘徊

叶兆言

人之本性,难免喜新厌旧,怀旧却会有别样风光,会很时髦,会显得很有文化。十多年前,南京大学文学学院院长董健老师曾经非常认真地问我,《南京人》中提到的那位老先生是谁,说这老先生的话很有道理,一针见血。弄得我很不好意思,《南京人》是我的一本旧书,他问的这番话是小说家笔法,是我伪造的,所谓老先生并不存在。董健老师很失望,做学问的人总是严谨,他向我打听出处,大概也是想在文章中引用,听我这么一说,只能叹气摇头。

我编造的这番话是什么呢?为什么董健老师会感兴趣?在《南京人》这本书中,我提到了民国年间有位老先生,他说:北京是个官场,就看谁官大,上海是个洋场,就看谁钱多。因此要做官,必须去北京,要挣钱,必须去上海;南京这地方什么都没有,做不了官挣不上钱,只能退求其次,老老实实做学问。“老先生”是文学加工的产物,结果董健老师信以为真,很多南京人也引起了共鸣。常常有人当面夸我,说这话有道理,说到了节骨眼上,说出了南京人的性格特点。有些在官场上混得不得意的人,甚至因为这番话,要与我结交,要跟我一起喝酒。

多少年来,作为一名小说家,我一直以偏重怀旧被读者所认同。不知不觉就成了“遗老遗少”,你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青年作家,已有人写文章将你归为老作家、“老夫子”行列。浑水摸鱼的怀旧让人多少占了些便宜,当然,有时也吃亏,毕竟老了会有过气之嫌。“谁道人生无再少?门前流水尚能西!休将白发唱黄鸡”,怀旧可以用来励志,励志不等于得志,仅靠怀旧在文

坛上打拼,显然没太大出息,也不可能会有更好出路,俗话说,“老而不死是为贼”,一味怀旧,注定死路一条。

小说家怀旧与史学家不一样,小说家可以想象,可以合理想象,甚至可以不合理想象。只要说得好,胡说八道并没有太大关系。小说家们虚构人物,设计好故事,在史家眼里是一堆幼稚的笑话,错误百出,漏洞无数。但是大家的目的并无二致,都是温故而知新,就好像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小说家也好,史学家也好,很少无缘无故地去怀旧。区别就在于方法不同,手段各异,真实标准不一样。

怀旧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小说家手中的利器,如何利用怀旧,怎么利用怀旧,有很多学问可以做。作为一名小说家,我想不妨思考两个问题。第一,你为什么要怀旧。简单地怀旧而怀旧,显然会有创作上的风险,小说家的怀旧总是别有用心,怀旧必须要有情怀,要有理想,要有最起码的人文关怀。第二,必须告诉读者,小说中的怀旧往往是虚构,文学的真实从来就不等同于历史的真实。换句话说,民国年间南京有没有那么一位老先生不重要,原话是否如此也不重要,重要的是能不能接近真相。我的关于南京人的性格描写,显然带有理想成分,也就是说希望南京人是那样,我只是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南京人。

事实上,我们都明白那些最基本的道理,都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,都知道真相并没有那么美好,南京人与北京人、上海人并没有那么大差异。现实是残酷的,很难让人满意,哪儿的人都想当官,哪儿的人都想挣钱,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说到底还是个文学人物,“无怀氏之民欤,葛天氏之民欤”,如果我们真相信五柳先生们确实存在,那也太天真了。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会有些差距,古人衔觞赋诗,只不过是為了以乐其志,也只能以乐其志,这一点,一千多年前的陶渊明先生早已经说得很清楚。

南京夫子庙的秦淮河边有个桃叶渡,说起来,也是一著名去处,有历史,有来头。喜欢书法的人都知道,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叫王献之,字写得比他爹还好,这个王献之风流倜傥,有位爱妾叫桃叶,住在河对岸,他常常亲自在渡口迎送,并为之作了首《桃叶歌》:

桃叶复桃叶，渡江不用楫，
但渡无所苦，我自迎接汝。
桃叶复桃叶，渡江不待棹，
风波了无常，没命江南渡。

历史上的传说往往不靠谱，不知猴年马月，有好事的人怀旧，在秦淮河边竖了一块石碑，基本上就把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故事给落实了。三人成虎，众口铄金，都这么说，大家也就深信不疑，都相信桃叶渡就在秦淮河边。明朝有位诗人叫沈愚，觉得这事不能这样以讹传讹，下工夫去考证，得出桃叶渡绝不可能在秦淮河边的结论，确切地点应该是在长江北岸的“桃叶山”下，那里的古渡口才是原址所在，因此也写了一首诗：

世间古迹杜撰多，离奇莫过江变河，
花神应怜桃叶痴，夜渡大江披绿蓑。

沈愚搁在历史上没名气，这首修正考订桃叶渡的小诗，自然没产生什么影响，知道的人也不多。结果就是，同样是怀旧，大家对真相都不感兴趣，王献之《桃叶歌》中明明白白写着渡江，短短一首诗中有三个“江”字，却非要视而不见，认定桃叶渡就在秦淮河边，就在今天大家都错误认定的那个地方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在怀旧中，真假有时候并不重要，将错就错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我们为什么会这样选择，这样的选择又会有什么样后果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选择性的怀旧完全有可能塑造出一个新的城市形象，毫无疑问，南京是一个滨江城市，然而它的城市建设，有意无意地总是沿着秦淮河在展开。多少年来，长江沿岸基本上都是破烂不堪，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江边，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。滚滚长江显得有些宽大，好像小桥流水才更适合南京，“夜泊秦淮近酒家”成为这个城市最好的写照，醉生梦死、灯红酒绿很自然地就成为标签，结果便是，像刘禹锡这样的大诗人，完全可以不用亲临南京，完全可以不用体验生活，就能轻而易举地写出脍炙人口的《金陵五题》。刘禹锡在这五首小诗前面有自序说明，强调自己并没到过南京，他的怀旧基本上就是凭空捏造。

桃叶渡与南京的关系大可一说，事实上，它不只是一个文人与爱妾的八卦，而且与这座城市的命运息息相关。“一种风流吾最爱，六朝人物晚唐

诗”，南京人喜欢说六朝古都，所谓古，也是怀旧的意思。可惜这个“旧”太遥远，说来说去，都是些不靠谱的传闻。南京几乎找不到什么货真价实的六朝文物，原因同样可以从桃叶渡说起。当然，这个桃叶渡不是秦淮河边那个伪造的假古董，而是长江对面的桃叶山古渡，想当年，隋炀帝杨广曾在此练兵。那时候的杨广年轻有为，还没被封为太子，他在桃叶山下秣马厉兵，目的就是为消灭南朝。结果大家也都知道，在桃叶渡那端，杨广虎视眈眈地做着准备，而在大江这边，陈后主仍然在醉生梦死，“妖姬脸似花含露，玉树流光照后庭”。很快隋兵渡江，六朝灰飞烟灭。“天子龙沉景阳井，谁歌《玉树后庭花》”，隋文帝下令杨广将南京这个城池给废了，于是该烧的烧，该毁的毁，这也是为什么南京这个古城很难见到六朝文物的真实原因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南京真的就这么被毁了，它归镇江所管辖，城市地位大大下降。

一个城市繁华起来了，一个城市破落衰亡了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原因，怀旧的目的可能就是为探索这些原因。南京的繁华是因为它曾经是古都，南京的破落衰亡也是因为它曾经是古都，繁华的原因同样可以成为萧条的原因。对桃叶渡遗址的怀旧，有助于我们用一种别样的眼光打量南京，我们回忆往事，徘徊在历史的废墟上，感慨六朝繁华，流连吴宫花草和晋代衣冠，说来说去，所有的怀旧和追古，结果还是为了抚今，为了讨论当下。事实也是这样，对于这座城市的凝视，如果我们的目光始终只盯着秦淮河，只是关心它的兴衰，只是在意它的发展，显然远远不够。

南京作为一座古城，承受了很多次浩劫，遭遇了一次又一次人为的厄运。如果说隋朝的故事太遥远，不妨说说比较接近的，譬如上世纪90年代，距离今天也不过二十年，二十年算什么呢，弹指一挥间。那些年，南京出了一位臭名昭著的砍树市长，这位市长是林业大学的毕业生，对种树没兴趣，伐起木来却是一把好手，作为一名大权在握的城市父母官，他恶狠狠地砍去了许多树，理由非常简单，为了亮化这个城市，为了彰显繁荣的商业气氛。在这位市长的脑海里，一个现代化城市，首先应该是灯火通明，繁华就是灯红酒绿，繁华就是高楼大厦。

国民政府时期的南京，有一位叫傅焕光的先生，主持首都的园林工作。在他的指挥下，城市的马路两旁共栽了一万多株法国梧桐。七十年以后，这些参天的大梧桐成为地标，让南京成为一座引以为骄傲的绿色城市。可是

在后来的这位砍树市长统治期间，在一个短短瞬间，说砍就砍了。“拔本垂泪，伤根沥血”，整个城市伤痕累累，真所谓顷刻间“生意尽矣”。有记者很认真地统计，发现被砍去的梧桐多达3 000多棵。在城市记忆中，这是非常惨痛的一次。它所产生的严重后果，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伤害和影响，难以估量。

这位市长最终受到惩罚，被判处了死缓，与这次砍树毫无关系，只是因为贪污受贿。我们今天可以公开议论，数落他的不是，声讨他的过错，并不是这个人错误地砍了树，因为砍树罪有应得，而是因为他已经失势。如果说隋炀帝当年奉父之命，将南京城池毁尸灭迹，还是出于什么政治目的，是统治者大一统江山的需要，那么今天这位利令智昏的砍树市长，除了愚蠢和无知，真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。在这样一个愚蠢和无知的市长主政下，古城南京的城市现代化规划，其糟糕程度可想而知。

南京作为一座经常被血洗、被征服的城市，它的忍受程度，相对于其他城市，要强大得多。逆来顺受是这个城市的基本特点之一，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然而在现代都市的建设中，老百姓通常都是无能为力的，种树或砍树，文物古建筑是不是要保留，肉食者谋之，当官的说了算，有权的人拍拍脑袋就可以决定。当然，大家心知肚明，不仅南京如此，中国的城市建设都有可能是这样的，所谓问责制度根本不存在。南京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中，虽然长官意志错误百出，教训深刻，却从来没有一任官员为规划失误买过单。

一个现代化城市，保持着适当的陈旧很有意义。再以同样让人感到骄傲的古城墙为例，因为日晒风吹雨打，因为战争，因为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，南京的明城墙到处都可以见到残缺。没有残缺就不是古城，断壁残垣有时候是一道非常好的风景，可以作为最好的历史标本。南京明城墙历经沧桑，有的是在太平天国攻城时被炸坏，有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被野蛮拆除，根据修旧如旧的恢复原则，如果不能恢复原样，就应该保持不变。多少年来，对于古城墙修建，我一直持保护态度，一直反对粗暴简单的修复和重建。十多年前，在一个讨论明城墙如何保护的专家会议上，我曾向有关领导提出抗议，说今天的新建正在对古城墙起着非常糟糕的破坏作用；大段大段新城墙拔地而起，成为十足的假古董，它不是在创造历史，而是在破坏历史。

新修的城墙和城门让人看上去惨不忍睹，城砖是新烧制的，上面竟然还

印着公元某年字样。南京市民和西安市民打嘴仗,争论哪家的城墙更好、更古老,人家就把图片发出来示众和讥笑。这种对文物缺乏最起码尊重的复古,把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折腾得不伦不类。我们都知道,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相对的,古城墙可以是一个城市的宝贵财富,同时,注定也是一种束缚,它对现代交通,对城市市民出行,会有非常大的影响。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,为了疏通交通,城市规划者就不止一次打过城墙的主意。事实上,南京市民今天早已习惯的那些被动过手脚的古城门,譬如玄武门,譬如中山门,还有仪凤门,早就不是原物,都是经过了加工和改造的。现在重新回顾它们,差不多已快一百年时间,想当年,人们对历史文物的认识,远不能和后来相比,然而考察当时的改造工程,和今天对照,仍然要高明许多。

首先,从美观上来说,各种比例关系还是对的,城门变高了,城楼也相应做了一些改变,看上去还不是太离谱。不管怎么说,仍然还是和谐的,大家也还能接受。改革开放以后的这几十年,南京市政府开始有钱了,明城墙保护的投入大大增加,决策者的重点只是一门心思,要把早已断裂的城墙重新连接起来。所谓保护,变成了重修围墙,就好像一个土财主暴富了,赶紧要用高墙将豪宅围起来。结果便是让人哭笑不得:中华门的東西两端,原有的豁口确实连起来了,变成一个整体,变成一个空中通道,上面可以行驶电动观光车,每辆车可以坐上十几个观光客。在一个现代化都市里,怀旧常会被这种非常浅薄的观光所替代,观光客需要的是热闹,是偷懒和舒适,而我们的决策者很在乎这种热闹,很在乎这种不动脑子的偷懒和舒适。

二十年前,我曾经陪同汪曾祺先生登中华门城堡,登高望远,追古抚今,他老人家很感慨,说这地方非常好,太好了,比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还要好。他老人家说得不错,中华门城堡确实是个好地方,可是现在又变成了什么样子呢?现在的这一段城墙完全变成了怪物,惨不忍睹,断裂的城墙连起来了,原本没有城门的地方,非常丑陋地出现了几个门洞。打一个比方,通常城门与城墙的关系,它们的比例应该是一个竖着的草鸡蛋,窄窄的,细细的,现在为了通行汽车,变成了一个个扁胖的城洞,仿佛一个洋鸡蛋,不是竖着,而是横卧在那里,远远看过去非常滑稽,非常难看。最不能容忍的是,这样的门洞还不止一个,在一段不是很长的距离中,比例严重失调的门洞竟然有好几个。

再也没有什么破坏比这个更让人痛心的了，为了城市的安全，一段城墙上只有一个门洞，这是最基本的道理，像现在这样接二连三，在短短一条连轴线上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仿佛河岸边的螃蟹洞，完全是莫名其妙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如果汪曾祺先生见到这一幕，他会怎么说？他又会发出什么样的感叹？在城市决策者眼里，汪先生的观点根本不重要，“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”，况且，文化人的观点也不可能铁板一块，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，我们都知道，很多错误决定和馊点子，本来就是那些没文化的文化人想出来的杰作。

有一年，台湾的张大春来南京做图书宣传，我有幸作陪，一位本地读者站起来指责，说我只知道躲在秦淮河边一味怀旧，对南京的砍树毫无表示。他认为作家在这件事情上是有责任的，有义务反对，作家是灵魂工程师，应该向鲁迅先生那样，路见不平，拍案而起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感受最深的不是这样提问对不对，而是和他一样，对城市的砍树、对古城墙的破坏，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怨恨。我想起了那次南京明城墙保护专家会议，当我提出抗议以后，参加会议的最高领导只是笑着点头，然后非常平静地总结陈词，说：叶先生的话很有意思，但是，我可能要很遗憾地告诉他，南京的这个城墙，我们还是要修的，还是要把它给连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墙，是独一无二的。

怀旧向来都是纸上谈兵，不妨再接着聊几句苏州。1129年，金兵南下，苏州古城毁于战火。其后一百年间，废墟中的苏州不断恢复和发展，当时的郡守李寿朋让人在石碑上绘制了《平江图》，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古代城市规划图，观察这幅图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茫茫太湖在城西，大海在城东，湖水自西而来，经苏州城潺潺东流，最后进入大海。要强调的一点是，古城内一条条河道都是人工开凿，它们构成了完善的城市交通系统，“水陆相邻，河街并行”，既成为古代苏州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常态，同样也是此后江南水乡城市的基本样板。

通过怀旧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可以造福市民很多年。苏州城多少年来能够独领风骚，与当初良好的城市规划分不开。有时候，一个城市遭遇了灭顶之灾，成为一片废墟，只要获得机会，计划得当，完全有可能